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本书缘起与宗旨、研究对象与方法	1
二、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发展主流概述	4
三、学说源流与发展主要阶段	6
1. 当代前驱(20 世纪上半叶)	7
2. 复兴时期(1940 年代中叶至 1950 年代末)	13
3. 扩展时期(195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末)	16
4. 多元化、深化时期(20 世纪末叶)	20
四、本书分析框架与体系结构	23
第二章 生育和生育率理论(上)	27
一、生育和生育率理论在西方人口理论中的地位及其变化	27
二、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	29
1. 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30
2. 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模型	34
三、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	37
1. 理论依据	38
2. 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模型	42
四、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理论	45
1. 模型建立的理论背景	45
2. 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理论模型分析	47
五、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49
1. 主要理论观点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49
2. 收入概念及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一般分析	51
3. 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 理论分析	54

4. 关于收入再分配对生育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56
六、财富流理论	58
1. 理论模型的提出	58
2. 理论模型的主要观点及其在 20 世纪末叶的进展	59
第三章 生育和生育率理论(下)	64
一、中介变量理论、生育率变量理论	64
1. 生育和生育率“中介变量理论”	65
2. 生育率变量类型研究	67
3. 生育率变量系统转变理论	72
4. 20 世纪末叶中介变量理论的新动向	72
二、生育率的社会学分析	73
1. 生育(率)决定的社会文化观点	73
2. 生育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75
3. 社会流动和生育率的理论分析	82
三、生育率的宏观分析	86
1. 生育率“长期效应”分析	86
2. 城市化、现代化与生育率变动	87
3. 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变动	89
四、生育率和人口素质分析	91
1. 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	91
2. 生活质量与生育率	92
3. 生育健康与生育率	93
五、生育率的生物学分析	95
1. 生育率分析中的生物学观点	95
2. “生物—社会因素”理论模型	96
六、20 世纪下半叶西方生育率理论分析视角的变化	97
第四章 死亡和死亡率理论	101
一、死亡率问题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概述	101
二、关于影响死亡率及其变动的决定因素的研究	103
1. 对“死亡率转变”的早期理论分析	103
2. 死亡率变动分析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	104
3. 死亡率变动分析的“中介变量论”	108

4. 对死亡率的“健康投入—产出”分析	110
5. 马哈迪温对死亡率的“生命影响变量”分析	112
6. 对影响死亡率变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分析	113
三、死亡率差别研究	116
1. 死亡率的年龄差别研究	116
2. 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研究	117
3. 死亡率的性别差别研究	121
4. 死亡率的婚姻状况差别研究	123
四、死亡原因研究	124
1. 死因分类研究	125
2. 死因模式研究	126
五、20世纪末叶西方死亡率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128
第五章 现代西方迁移理论	135
一、非经济学观点的宏观迁移理论	136
1. 对迁移规律的论述	136
2. 推力—拉力理论的问世与发展	139
3. 迁移量、迁移方向和距离理论模型	141
4. 迁移社会模式	144
5. 迁移生态学理论	146
6. 迁移的系统研究模式	147
7. 世界体系理论关于迁移的主要观点	149
二、迁移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	150
1. 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150
2. 资本与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	151
3. 比较静态理论模型	152
4. 人口压力理论模型	155
5. 通货膨胀过程理论	156
6. 二元经济结构、两个部门理论模型	156
三、迁移微观理论：迁移动机和迁移决策研究	158
1. 迁移动机理论研究	158
2. 迁移决策理论研究	161
四、迁移选择性和迁移后果研究	167
1. 迁移选择性和迁移后果理论研究概述	168

2. 迁移选择性和后果的人口学分析	169
3. 迁移选择性和后果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	170
4. 迁移的文化和种族选择性分析	171
5. 迁移后果的社区分析	172
五、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国际迁移理论发展脉络概述	174
第六章 现代西方人口城市化理论	182
一、西方人口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历史源流	182
1. 西方人口城市化的三个主要的理论模型	182
2. 1970 年代末以前西方人口城市化理论研究的进展概述	185
二、20 世纪末叶西方人口城市化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186
1. 1980 年代西方人口城市化理论研究动向	187
2. 1990 年代西方人口城市化理论研究动向	188
第七章 关于人口自然构成的理论分析	193
一、对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的早期理论分析	193
1. 早期对人口年龄构成的理论分析	193
2. 早期对人口性别构成的理论分析	196
二、人口老龄化的理论分析	197
1. 西方人口老龄化理论研究源流概述	197
2. 现代西方人口老龄化理论研究新动向	204
三、女性人口理论研究	208
1. 西方女性人口理论研究源流概述	209
2. 现代西方女性人口理论研究新动向	214
第八章 家庭人口学：人口与婚姻、家庭的理论研究	223
一、家庭人口学研究的兴起	223
1. 家庭人口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224
2. 家庭人口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	227
二、家庭转变理论	229
1. 家庭转变理论的基本观点	230
2. 影响家庭转变的人口学因素分析	232
3. 影响家庭转变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234
三、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236

1.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一般概念	236
2. 家庭生命周期模式分析	239
3.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扩展与完善	242
四、20 世纪末叶人口与婚姻、家庭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246
1. 时代背景的变化	246
2. 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247
第九章 当代西方控制人口增长学说	254
一、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演变过程	254
1. 思想渊源与历史背景	254
2. 演变过程	260
二、当代西方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理论	262
1. 人口压力与土地负载能力有限论	262
2. 人口危机与社会发展停滞论	266
3. 人口爆炸与生态环境恶化论	268
4. 人口爆炸与自然资源枯竭论	270
5. 人口控制与物质增长极限论	272
6. 人口控制与人类有机增长论	276
三、20 世纪末叶西方控制人口增长理论新动向及其评价	279
1. 食物供应、土地负载能力的人口压力	279
2. 经济增长极限、失业与贫困问题的人口压力	280
3.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现代化面临的人口压力	282
第十章 当代西方适度人口理论	286
一、适度人口理论的思想渊源、理论特征和发展阶段	286
1. 思想渊源	286
2. 理论特征	288
3. 主要发展阶段	290
二、当代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主要理论模型	291
1. 人口规模适度理论	291
2. 人口福利适度理论	295
3. 人口增长适度理论	301
4. 人口调控适度理论	305
5. 人口零增长和适度人口理论	309

三、简要评论	314
第十一章 当代西方人口转变理论	318
一、人口转变论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	318
1. 人口转变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318
2. 人口转变论的形成与演进	320
3. 人口转变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在当代的主要特点	324
二、人口转变论(按不同阶段划分)的基本理论模型	328
1. 人口转变论的三阶段模型	328
2. 人口转变论的四阶段模型	334
3. 人口转变论的五阶段模型	336
三、20 世纪末叶西方人口转变论的新动向及其评价	338
1. 关于人口转变内在动因的争论	338
2. 关于人口转变论的区域适应性的争论	340
3. 对人口转变论的最新评价和对世界人口转变趋势的预测	341
第十二章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346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	346
1. 时代背景	346
2. 思想渊源	349
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及其在 1994 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 的阐述	350
1.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与 演进	350
2. 1994 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纲领》对可持续发展的 论述	353
三、1994 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 进展	355
1. 1990 年代末叶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进展	355
2. 简要评价	356

第一章 导 论

一、本书缘起与宗旨、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书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系统地论述、评介现代西方人口理论主要内容及其演进过程的著作。作者希望通过系统评介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主要学说、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主要观点,使读者能够对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发展脉络、发展水平获得比较全面、系统、如实和深入的了解。

本书实际上是作者以往主编的《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的增订本,是在《当代》一书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的产物,在基本内容方面有许多沿袭《当代》一书的地方,但是结尾已经由人口转变理论推进到可持续发展理论,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本书的编辑出版是应客观需要。作者主编的《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在 1992 年出版以后,受到广大人口研究工作者的欢迎,不少人口教学研究机构把该书列入人口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目,或者列为考人口专业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然而事隔多年,该书现在已经基本绝版,已经很难从书店和出版社购得。更不用说在十多年之后,情况已经发生许多变化,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发展已经出现不少新的观点、新的动向,《当代》一书已经不能涵盖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发展的全貌,客观上迫切需要重新出版一部论述西方人口理论发展过程直至 2000 年的新书。这部《现代西方人口理论》正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而编写问世的。

在 1990 年代初,我们曾经指出,我国人口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日益繁荣,研究领域日益扩展,研究课题日益广泛,涉及的学科日益增多,研究机构也不断增加,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也大为加强,对策性、应用性人口研究得到显著发展,在采用现代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调查研究与定量分析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同改革开放初期蓬勃发展的情况相

比,人口理论研究自 1980 年代以来是相对沉寂、相对停滞了。

人口理论研究的这种状况,同我国在 20 世纪末叶面临的严峻的人口形势不相适应。虽然,在 1990 年代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自 1998 年起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 1% 以下,但是总人口规模仍然持续增长:1990 年总人口由 1980 年的 10 亿增加到 11.4 亿以上,2000 年又增加至 12.7 亿,预测 2010 年将近 14 亿,2025 年可能达到 15 亿。与此相联系,中国在 21 世纪将面临一系列严重的人口问题的挑战:在 2045 年以前,人口对粮食、土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将持续增加,人均非再生性自然资源占有量将相应地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 2040 年以前将持续增加到 10 亿以上,继续对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仍将增加,需要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在业人口数量将达 3 亿以上,不仅形成巨大的隐性或显性的就业压力,而且成为数量庞大的乡村—城市迁移流动人口的源泉,民工潮将持续冲击城镇;在上述人口发展状况下进行的产业结构转型,不但将会有大量职工下岗,而且再就业难度很大,将会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

毫无疑问,针对我国各种实际人口问题,尤其是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以及改善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应用性与对策性研究,在 21 世纪仍然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但是,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往往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这类研究往往就事论事,不能分析全局性的、长远期的、规律性的问题。要想治本,要科学地揭示人口发展规律、科学地预见人口发展的未来趋势,就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建设。理论研究是应用性、对策性人口研究的基础。

早在 1990 年代初我们已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发展,固然首先是科学地总结人口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实际经验,但同时还应当批判地继承包括西方人口研究的科学成果在内的世界精神财富。理论的发展必须以现存的各种思想资料做起点。科学知识,包括人口研究的科学知识,是人类共同财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应当批判地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不仅如此,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多元化和一体化并进,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同世界的其他部分共同影响着地球的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并且互相影响彼此的发展。这在信息时代,新科技时代更加明显。何况,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在许多方面走在我们的前头,无论在人口发展实际经验上还是理论研究上都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因此,中国人口研究不能不重视和了解西方人口研究、西方人口理论的演进,特别是 20 世纪末叶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新观点、新动向。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现代西方人口研究成果,尤其是定量

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但相形之下,对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评介工作比较薄弱,在《当代》一书出版之前固然缺乏系统和全面的论述,而在《当代》出版之后的十多年仍然缺乏评介到 2000 年西方人口理论的同类著作,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我国人口理论研究的发展。

在 1990 年代初,我们还曾指出,编写《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的目的在于促进中国人口理论的发展,为完成我国人口研究的战略任务服务,为人口学科建设作出应有的奉献。这同样是我们编写《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前者的新编。编写《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同样是一项极有意义而又极其困难的工作,目前在西方涉及人口理论的著作如汗牛充栋,我们受条件的限制能够看到的极其有限,对非英语的人口著作更是知之甚少,主要资料来源无非是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PDR)、*Population Studies*、*Demography*、*Population Indices* 等英文人口杂志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出版物,虽然我们已尽力收集有代表性的西方人口理论的第一手资料,但疏漏在所难免。何况当代西方人口学说派别繁多,观点纷纭,怎样从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学派、学说、代表人物、代表著述,殊非易事。而且,国内外学术界对各种人口学说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经过作者的努力,在《当代》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理论体系,补充以 20 世纪末叶西方人口理论的新观点、新动向,相信本书可以进一步满足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了解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需要。本书不仅可以供人口专业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之用,而且可以给有一定专业基础的人口研究工作者,甚至专家学者研究人口问题在理论上提供参考。

本书的研究对象和论述范围是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演进过程、主要观点与发展趋向。所谓现代西方人口理论,本书是指从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 2000 年的西方人口学说,尤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西方人口理论观点。而所谓西方,自然是指以欧美,特别是美国为主的西方工业社会。人口理论的研究领域比规范人口学要广泛,不限于人口过程本身,还包括人口过程和其他社会过程的关系。人口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严格说来,其研究对象是科学地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理论观点。然而,对西方人口理论来说它不一定能够客观地反映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不能降格以求,只要是对人口过程有言之成理的自成体系的现代西方理论观点,都可以列入本书研究范围。无可讳言,人口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西方首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发展在世界占有领先地位,因此,虽然降格以求仍不失参考价值。

本书着重评述那些研究人口数量变化、人口自然变动(生育率和死亡率

理论”(Total Population Theory),主要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总人口发展过程及其增长极限;另一种是“人口变动因素理论”,主要从人口内在变动因素如出生率(生育率)和死亡率等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来研究人口变动;还有上述二者的综合,它以往的典型是“人口转变论”,主要通过考察社会经济发展和以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动为标志的人口发展阶段的关系,来说明人口转变过程。

一般认为,科学的人口统计分析和比较系统的人口理论观点,最早出现在约翰·格兰特(John Graunt, 1620—1674)的《对死亡率表的自然和政治观察》(1662)和 W·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的《政治算术》(约 1676 年写成,1690 年出版)等著作中。前者最先用近代人口统计学方法分析当时所能得到的关于死亡人数和死因的统计资料,编制了死亡率表,提出了不同年龄死亡人口分布规律,以及新生儿性别比一般偏高等数量规律,并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视为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因此可以看作是“人口变动因素理论”的始祖。而后者不仅分析了人口和财富特别是人口和土地的关系,而且把劳动力作为基本国力来进行计算,正可以看作是“总人口理论”的先导。然而,人口理论在西方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是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以 T·R·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原理》第一版在 1798 年出版为标志。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系统分析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一个研究总人口变动及其极限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论,一个在西方被称为“总人口理论”的理论分析模型。在西方人口理论发展历史上,从马尔萨斯直至 J·M·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亦即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以马尔萨斯人口论和适度人口论为主要代表,“总人口理论”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到 20 世纪中叶,大约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人口转变论”一度在西方占有主导地位。而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 20 世纪下半叶“人口变动因素理论”才逐渐成为西方人口理论发展的主流。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急剧增长和持续增长,人们逐渐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在人口自然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已非死亡率变动,而是生育率变动,于是出现了许多研究生育率变动的人口理论。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生育率研究已经成为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是否把生育率研究放在人口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甚至被看作衡量是否是现代人口理论的主要标准。在这期间,西方人口学的一半课程是和生育率密切相关的,人口学论著的题目大都集中关注生育率研究,这种情况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以后才有所改变。

应当看到,当“总人口理论”在西方人口理论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时,人口发展过程和其他发展过程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当人口内在变动因素理论在西方人口理论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时,人口过程和其他发展过程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几乎被排斥在正统的人口理论研究之外。这后一种趋势在 1980 年代后期似乎已经走向极端,结果使西方人口研究的领域日趋缩小,道路愈走愈窄,人口理论研究的发展基本上陷于停滞。显然,如果人口理论研究不能从这个死胡同里走出来,不能及时地扩大其研究领域,其前景将是十分可悲的。上述情况直到 1990 年代中叶才有所改变,虽然生育率研究还占据重要的地位,讨论生育问题的论文为数仍然最多,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学课程和人口论著转向人口与环境、人口迁移、人口老龄化和健康等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贯穿现代人口理论研究的战略思想。同时,随着人口研究的内涵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以往简单化的人口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需要,已经有人口学者建议要尽快建立一元化、综合性的人口理论模型(John Caldwell, 1997)。预计在 21 世纪人口理论研究的内涵将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多元多层次的分析方法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了解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它在 20 世纪末叶的新观点和新动向。

三、学说源流与发展主要阶段^①

继阐明西方人口理论发展的主流之后,我们进一步概述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源流,考察的范围一般地以 20 世纪以来西方人口学说的主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为限。而且,20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人口理论也只作为当代前驱加以考察。进入 20 世纪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人口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和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人口学、人口理论日益从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融入人类知识宝库之中;另一方面,人口研究和人口理论又不断地和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统计学等相结合,显示其多边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特点,及其对人口决策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日益重要的影响,为世人所瞩目。追溯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发展源流,可以划分

^① 在《当代西方人口学说》里,本节由李竞能、李建民执笔撰写。

以下四个阶段来进行考察。

1. 当代前驱(20 世纪上半叶)

20 世纪初至 1940 年代中,是西方人口学说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和适度人口论长期统治之后复兴的理论准备阶段,也可以说是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前驱或开拓奠基阶段。在这个时期,世界人口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格局:一方面,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长期持续下降,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类型转变的过程;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仍处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类型过渡的阶段,世界人口规模仍在继续增加,1930 年已达 20 亿,而且其增长速度日益迅猛。在世界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经广泛地为人们所感受和注意到,也引起西方学者对人口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对人口研究的重视。在这个时期出现或发展的、并为作为后来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渊源的人口学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适度人口论的问世与发展。人口理论的发展,在初期和经济学说的发展有比较密切的关系,适度人口论的问世与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理论模型出现并发展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时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长期停滞,不能满足它们扩军与经济增长的需要。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家和人口学者开始认为:“人口过剩”与“人口不足”都不是理想的人口状态,应当寻求“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亦即既非人口过剩、又非人口不足的“最优人口”。在 20 世纪初到 1930 年代末,“适度人口”问题逐渐成为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

最先提出近代适度人口理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 E·坎南(Edwin Cannan, 1861—1935)在 1888 年写的《初级政治经济学》。但是,最先明确地提出“适度人口”概念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J. G. K. Wicksell, 1851—1926)^①。而坎南在其 1914 年出版的《财富论》一书,最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适度人口论。坎南认为,人口是否需要增加,不仅要看它对农业收益的影响,而且还要看它对全部产业的影响,即人口增长是使工农业收益递减还是递增^②。他指出,任何时候工农业生产都有一个“最大收益点”,假如人口

^① 参看威克塞尔:“论适度人口”,《新的一代》1910 年 10 月。

^② 坎南:《财富论》,伦敦 1920 年第 2 版,第 66—67 页。他上述观点被认为超越了传统的收益递减规律的局限。

还没有大到足以使全部产业达到这个最大收益点,便是“人口不足”;相反的,假如人口增长已经超过最大收益点,便是“人口过剩”,这时解救的办法则是减少人口^①。在他看来,使工农业生产达到最大收益点的人口是最理想的人口,实际上也就是“适度人口”。

在坎南之后许多学者发表了有关适度人口论的著述,其中以英国学者卡尔—桑德斯(Carr-Saunders, 1886—1957)的影响较大,他在1922年出版的《人口问题》里声称,“提供按人口平均的最大收益”的人口,就是人口的“适度数量”^②。其后在1925年再版的《人口》一书中,他又论述了人口的“适度密度”,即使居民获得高生活水平的人口密度^③。到20世纪20—30年代,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在西方已经形成人口研究热潮,在1927年日内瓦第一次国际人口学会议和巴黎国际人口学会议上,适度人口论都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个时期,受福利经济学思潮的影响,已经有学者开始用福利的观点来考察和论述适度人口,例如法国著名学者A·兰德里(A. Landry, 1874—1956)就曾经认为:适度人口是能保证人类最大幸福的人口。可以说,适度人口论是继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之后在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人口学说。虽然,当时流行的还是“古典的”静态适度人口论(即假定技术水平不变条件下的适度人口),但是已经为现代的动态适度人口论打下了基础,并且是人口目标的规范研究在理论上的先声。

(2) 人口转变论的出现与演进。西方人口理论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人口转变论”的创立。随着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历史过程基本结束,一些西方人口学者开始用历史的实证方法,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过程、主要阶段和演变规律,特别是分析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原因,由此开始创立人口转变理论。法国学者A·兰德里和美国社会学、人口学家W·S·汤普森(Warren Thompson, 1887—1973)被认为是“人口转变论”的初创者、奠基人。

A·兰德里在他发表于1909年的《人口的三种主要理论》中已经提出,同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发展经历了原始阶段、中期阶段和现代阶段^④。他在1934年出版的《人口革命》一书,进一步论述了人口发展三阶段,并把两个阶段之间的人口转变称为“人口革命”^⑤。汤普森在1929年发表的《人口》一文,

① 坎南:《财富论》,伦敦1920年第2版,第69页。具体内容见本书第十章。

② 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的研究》,1922年版,第476页。

③ 参看卡尔—桑德斯:《人口》1925年版第5章“适度密度”。

④ 参看基拉德(A. Girard)为兰德里《人口革命》1982年版所写的序,第9页。

⑤ 参看兰德里:《人口革命》,1982年巴黎版,第169页。具体内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联系经济发展和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动趋势,把世界人口分为三类地区,实际上反映了人口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①。

人口转变论在这个时期虽属初创,还没有像适度人口论那样流行,但是它对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这不仅由于它为现代人口转变论奠定了基础,而且因为它是总人口理论和人口变动内在因素理论最先的综合,打破了已往人口研究长期限于考察总人口变动的框框,开始结合分析人口变动内在因素、即出生率(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及其原因与后果。如前所述,其后生育率研究就成为现代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其次,它最先结合人口再生产过程探讨人口发展的历史阶段,为研究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开拓了一条新路。此外,人口转变论在其初创阶段虽然还未摆脱理论演绎的影响,但是在大体上已经是依据人口统计资料和调查资料进行的具有实证性质的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开当代人口实证研究的先河。

(3) 社会学派人口学说的发展。自社会学创立以来,人口始终是西方社会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人口研究往往成为他们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形成人口理论研究中的社会学派。在 20 世纪上半叶,许多社会学家发表了人口论著,而作为先驱对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影响比较大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以法国社会学家 A·杜蒙特(A. Dumont, 1849—1902)和美国社会学家 W·S·汤普森为最著。

A·杜蒙特在他 1890 年出版的《人口与文明——人口学的研究》和 1901 年出版的《人口学的道德基础》中,以社会学观点研究人口问题,提出和论述了“社会毛细管学说”。他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解释法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长期发展停滞的现象。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想从社会上低的地位向高的地位上升的倾向”;人们不断地在社会阶梯上向上攀登,恰好和灯油依靠顺着灯芯上升相似,“这样的现象就叫着社会的毛细管现象。”^②在现代社会,上升的机会越多,人们追求上升的欲望越大,社会毛细管现象也越强,人们为了减轻向上发展的负担,就要求减少生育,所以生育率变动和社会毛细管现象成反比例。杜蒙特的“社会毛细管理论”对现代人口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最先系统地分析了社会直向流动同生育率变动的关系,而且还在于它触及人类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动机制,为后来的生育率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W·S·汤普森不仅是人口转变论的创立者之一,而且是 20 世纪 20 与 30 年代西方人口研究的社会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 1930 年出版的

① 参看汤普森：“人口”，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34 卷第 6 期（1929，6），第 959—975 页。

② 杜蒙特：《人口与文明——人口学的研究》，1890 年巴黎版，第 106 页。

《人口问题》一书,到1942年再版时已经成为社会学派研究人口问题的代表作。他强调人口研究的综合性,反对用“纯经济观点”来说明“适度人口”,认为社会组织、技术发展、人口构成和密度、人们的消费方式与生活习惯、甚至宗教都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有重大影响。他强调经济以外的社会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把社会进化的、生物的、福利的观点都折中在一起来分析人口问题。他特别重视人口数量和社会福利的关系,认为考察人口问题“不能离开人类现在的和将来的福利。”^①他在人口研究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最先系统地分析了差别生育率,特别是不同阶级的差别生育率,并把它看作是人口质量变化的根源。他的人口学说对现代西方社会学派人口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盛行的美国,仍然有较大的影响。

(4) 数理学派或统计学派人口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初期,运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人口研究,获得了两个突破性的进展,这就是“稳定人口”(Stable Population)模型的创立和“逻辑斯蒂曲线”(Logistic Curve)的重新发现。

美国人口学家A·J·洛特卡(A. J. Lotka, 1880—1949)运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在1907年首次提出“稳定人口”理论^②。他认为,如果一个封闭的人口按照固定不变的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而变化,经过一个时期之后,该人口的年龄构成将处于稳定状态。1925年他进一步运用数学方法求出了稳定人口模型的基本公式:当增长率 k 为正值时,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形成增长型稳定人口;当增长率 k 为负值时,人口总数不断缩减,形成缩减型稳定人口;当增长率 k 等于0时,人口总数不增不减,这时的稳定人口便成为静止人口。最终形成的稳定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真正的”或“内在的”自然增长率^③。

洛特卡的“稳定人口”理论,对于人口资料的评估与估算,对人口再生产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以及对人口过程各种变量的深入研究,都有重大意义,使人口再生产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在西方人口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因此,他的“稳定人口”理论被西方人口学者推崇为人口学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逻辑斯蒂曲线”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学者R·珀尔(Raymont

① 汤普森:《人口问题》,1942年版第5页;还可参看同书,第41—42页。

② 参看洛特卡:“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科学》,新系列(1907年7月5日)第26期(总653期),第21—22页。

③ 参看杜宾(Dubix)和洛特卡:“论真正的自然增长率”,《美国统计学会杂志》(1925年)第20期,第305—339页。

Pearl, 1879—1940)和里德(L. J. Reed)在1920年重新发现的。他们用对果蝇做集团试验的方法,发现了和雅尔乌斯特(P. F. Verhulst, 1804—1849)在1838年已经提出的同样的“逻辑斯蒂曲线”,在西方人口学界迅速引起重视。他们对人口增长的理论模型提出了5个前提条件:a.空间是有限的;b.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增长有其最大限度;c.它的最小限度是零;d.它的增长带有文化阶段性或者循环性,是积累性的;e.人口增长的一般形态可以描画成曲线,起初增长速度上升,最终达到最大点,以后渐减,而达到一个为特定空间和文化阶段所规定的人口极限。“逻辑斯蒂曲线”所以在当时西方人口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主要因为它描述了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而这正是当时西方工业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此外,它所描述的人口发展趋势恰与“人口转变论”的观点不谋而合。它在研究方法上也给现代人口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

(5)“经济停滞论”的出现。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特别是生育率研究,一方面包括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生育率变动的影 响,另一方面又包括人口变动、生育率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后一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逐渐引起西方经济学家和人口学者的重视,成为人口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受到重视,在当时西方社会有其经济背景: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急于在经济制度以外寻找解释危机产生的原因,急于寻找摆脱危机和衰退的出路。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J. M. Keynes, 1883—1946)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把危机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西方工业国家人口增长率的长期下降,被说成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在1937年发表的《一个衰减中的人口若干经济后果》里,更具体分析了人口增长率衰减对资本有效需求的影响。他声称,“资本需求取决于三个因素:人口、生活水平和资本技术。”^①由于现代经济条件的变化,资本技术对资本需求的影响已经不太大,因此,“资本需求的增加,主要应归因于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②如果生活水平没有足够的提高,人口减少会使资本需求减少,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如果人口长期处于衰减状态,有效需求不足也会长期存在,并导致经济处于长期停滞。

凯恩斯上述观点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A·汉森(A. H. Hansen, 1887—1975)等人所继承。汉森在1936年所发表的《经济进步与人口衰减》和1940

① 见《凯恩斯全集》第14卷,1973年版,第126页。

② 同上书,第128页。